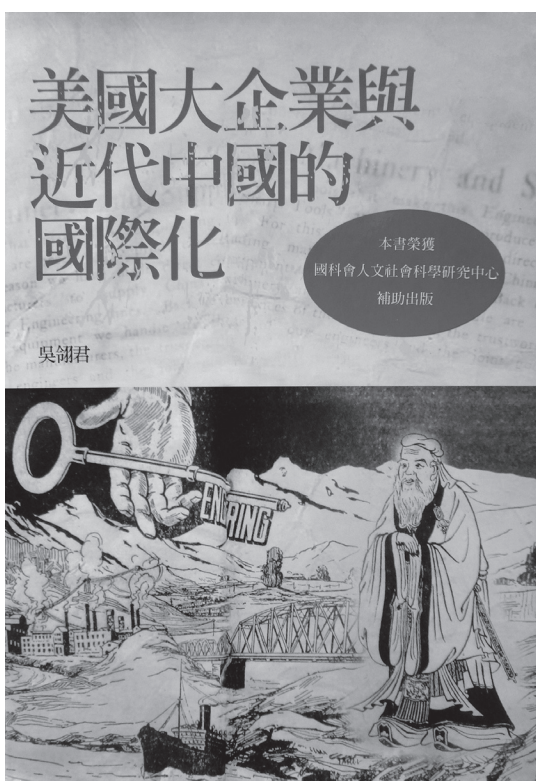




「補助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書」之專書—— 《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心得分享

吳翎君*



前年（2012）我在聯經公司出版了《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本書原為本人申請科技部（原國科會）專書寫作計畫《清末民初美國在中國的實業投資》（NSC 96-2420-H-026-001-MY2）之成果。全書共十章，432頁，

*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

30 萬字，係作者近年的系列研究，在科技部專書寫作計畫的補助下，改寫成具整體架構及系統論述之學術專書。正式出版後，很幸運的又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補助，在此要感謝科技部審查委員的鼓勵和肯定。當《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的編輯邀請我寫篇專書出版的心得分享時，我毫不猶豫的答應，理由是這篇小文或許可和年輕學者們分享個人學術之旅中的一點心得。

《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是我的第五本學術專書，也是寫作時間最長的一本書。之前的碩、博士論文和升等著作，均在逼人的時間壓力下完成。作研究本身是件快樂的事，自在悠遊於學術天地之間，不必急於求成；但「專書寫作計畫」則是一個寫作時間表，對於講求慢火溫燉的人文學者而言，究竟是好是壞，我不敢說。至於我個人而言，歷年的科技部計畫都是延續一個大題旨的研究脈絡，當逐年的計畫成果已積累到六至七篇的期刊論文，我決定給自己適當的壓力，於是申請了兩年期的專書寫作計畫，鞭策自己朝目標前行。

我的學術專業是中美關係史，從 1984 年進入臺大碩士班習作碩士論文〈晚清中國朝野對美國的認識〉，在中美關係史的研究領域的摸索，於今已有三十年了。在過去的研究領域選題經驗中，我也和多數學者一樣，從每個子題中一路延續自己的研究脈絡。在碩士論文的〈結論〉曾提到「清末立憲派、革命派其對美國政治制度之理念，當可另闢專文討論」。數年後，我在政治大學歷史所的博士論文探討民國初年美國與中國南北兩個政府的政治承認、民族主義之動向與外交關係，即肇始於碩士論文的淵源。而在撰寫博士論文中，因處理 192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高漲與此起彼落的排外運動，發現美國政府的撤僑行動竟有不少是在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亦即洛克菲勒創辦的標準石油公司）的辦事處召集，引發我對美孚石油公司的興趣，此後便一頭栽進美國企業史研究。然而我因是研究傳統政治外交的底子，自然留意到美國大企業在華活動及其政府政策之間的關聯。

《美孚石油公司》是我研究中美關係史的一個轉折。個人對於傳統的國際政治關係史的研究興趣逐漸轉向，朝向更廣脈絡的中美關係史研究。在美孚的研究中，我關注的是「企業、政府與外交層面」，後來在爬梳資料過程中感到西方大型企業與近代中國技術轉讓和科學文化等方面的不可切割，開始對「企業、經濟、技術與文化」等多層次面向的中美關係感到興趣，而非僅集中



於政治外交面向。而這一時期也剛好是 1990 年代以後歐美學界對傳統外交史的研究何去何從有些反省，代之而興的是國際史和全球史的研究趨勢。一些外交史學家同時也意識到傳統政治外交史過度重視政府角色、軍事和外交談判，而忽略文化、經濟、科技、媒介、信息等重要因素。以傳統國際關係史成名的大家入江昭陸續出版了數本有關全球化議題的國際關係研究，包含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議題的多方位視角，一些國際史的著作響亮問世之後，我個人深受影響而逐漸轉移了研究興趣。關於國際史研究的想法，我曾發表於《新史學》22 卷第 4 期（2011 年 12 月）的文章〈從徐國琦新著 *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 談國際史的研究方法〉，有興趣的年輕讀者或可一讀。

《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一書，探討十九世紀末到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中國的投資活動與中國近代的國際化歷程。過去關於清末民初對外關係的研究，較少從中國為主體的國際化視角與具體個案來看待其重要性。本書認為自清末以來即和中國逐漸形成「特殊關係」的美國，其在中國市場的投資活動與中國的國際化息息相關，尤其是一次大戰前後更為關鍵。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商人在中國市場的商業管理和組織形態，出現較大的轉變。伴隨著老式洋行和中國買辦制度的消退，在美國總公司指揮下，逐漸建立起銷售網及專屬經理人，形成早期的跨國企業，而這些粗具跨國企業形態的公司對中國市場的投資，也從早期公司本身產品的銷售，延伸到對中國市場的進一步開發與投資，像美孚公司即是一個典型個案。十九世紀末以後美孚公司對中國市場的投資，除了本身起家的油產品貿易外，還陸續投資於中國內河輪船航行、公路建造和探勘油礦等。其次，有別於進出口貿易的經營，美國工礦企業界在此一世紀之交，對中國實業建設有進一步的投資興趣，例如修築鐵路、開礦、架設電報線及修浚港口的工程投資等。這些實業投資，多肇始於清末，而於一次大戰前後有更大的投資熱潮。在我的書中探討幾個較大的代表個案如下：1914 年巴拿馬運河竣工之際，一部分的工程隊風塵僕僕加入中國啟動的整治大運河工程，寫下了民初中國與國際水利科技的接軌；而同年爆發的一次世界大戰也拉近了中國與世界的距離。大戰初期，美國並未參戰，美國最具財力的實業家，包括摩根公司、紐約花旗銀行和美孚石油公司等大公司，有意移轉在歐洲的部分資金，因而活躍於中國市場。一次大戰同時是無線電訊發明後首次用於壕溝戰，顯現無線電訊在軍事

和商業的無窮價值，與美國政府關係密切的合眾電信公司也於此時赴中國投資。這些美國大企業在中國的活動，其又和清末以來列強在中國的既有勢力和競爭無法切割。究竟上述投資活動對中國的實業建設、技術升級與國際化帶來怎樣的衝擊？本書探討中國如何藉由與美國大企業的交往改變近代中國的命運及其國際化之成敗歷程。

簡單交代上述個人的研究歷程之後，我個人特別要感謝科技部人文司。這些年我個人的研究如果不是一直有科技部計畫的經費支持，根本是無從開展的，特別是蒐集美國方面的資料。我在處理個案研究時，基本上是通過中英文材料的比對來重建故事，儘管近年來檔案數位化資料庫的建置已使得檔案資料的運用越來越為快速便捷，但在撰寫專書之初，世界各大圖書館數位化工作才剛剛開始，於今事實上仍有很多的檔案是躺在圖書館的一角，等待我們去挖掘的。《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一書曾利用的國外圖書館，包括美國國家檔案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美國弗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 UVM）、哥倫比亞大學、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香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南京第二檔案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有人將檔案館比喻為「年輕學者的牢獄」，而我們這幫人則如同「志願者囚犯」（voluntary prisoner）。事實上，浸淫檔案久了，也會發現看檔案的竅門，而有時解開一些從未被人拆開的 rarebook，常令人有種探險奇航的感受。我個人的學術訓練主要在國內完成，這些年主要因科技部補助和擔任美國 Fulbright 學者的訪問機會，得以讓我漫遊天下，拓展世界觀；也因這樣的契機又得以和世界各地的學者交流，參與各項國際會議，萬事互相効力，個人研究視野的開展也受益於上述這些研究機緣。

因著種種的學術機遇，這些年靜心走了世界著名的幾個圖書館，特別感受世界級的圖書館可能是一個學校、城市，甚或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指標，圖書館的收藏和管理更是一種古典精神和文化深度的表徵。美國的國家檔案培養了一批研究人員，他們非常熱心，圖書館員將服務讀者作為主要職責，有任何研究上的疑難或是找檔案上的困難，他們總是熱心幫助，他們希望研究者能充分利用資料，越多人來利用資料，更顯示該館的價值，這點令我印象深刻。這二年又在大英圖書館和英國國家檔案館發現一些研究資料讓我欣喜莫名。很難想像同樣有上百位學者在大英圖書館的每個樓層用功，當然這群



人當中有不少是學者們請來的助手，有不少是退休人員，他們累積長年經驗，有著既準且快的查檔能力，專門幫學者們蒐集資料。走訪英美各大圖書館，感受到檔案和圖書被利用的盛況，吾道不孤必有鄰，看到有些學者甚至每天比我早起抵達圖書館用功，這種探尋學術尖塔之夢的執著精神真是激勵人心！

對於在大學任教的學者而言，要同時兼顧教學和研究，實為不易，研究工作常被繁重的教學和各式瑣碎的行政工作打亂，以致無法持之以恆。我比較幸運的是，在撰寫專書計畫的最後一年申請教授休假，如果不是有這一年的休假，本書的出版勢必延後。在文稿修正的階段，我又很幸運的申請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六個月的學術訪問（後來延期到九個月），讓我得以利用中研院豐富的學術資源來修改論文。在許多的「幸運」機緣之下，成就了本書的出版，也算是對自己的研究歷程一路走來「莫忘初心」的交待。

1996年我回到故鄉花蓮任教時，當時的花蓮師範教育學院（後改制為大學，2008年與國立東華大學合校）以培養教育人才之公費生為主，學生素質高，教學愉快；但相對而言，並不鼓勵老師作研究。初到花師時，對於自己未來研究如何開展甚為惶恐，恩師杜維運老師和指導教授張玉法院士對我鼓勵最多。杜老師遠在溫哥華，時常來信敦促我，老師生前我曾去溫哥華探望他，得知年高八十的杜公，凌晨四時起身讀書，從不間斷。杜維運師一生從不做學術行政，淡泊名利，成就古之學者「為己之學」的高節風骨，令我佩服。張玉法師則悠遊於學術研究和行政，且正式指導的碩博士又超過四十餘人，老師擅於有效且精準完成各項任務，有條不紊，毅力驚人。張玉法老師在我出版《美孚石油公司》和《歷史教學理論與實務》一書後，來信說「你在東部開出一片天，甚慰。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老師的話語常使我想以擔任行政職務為藉口偷懶不作研究時，思及玉法師即使退休後仍在趕寫《中華通史》以履行三十年前他和東華書局的約定，便不敢怠惰了。《美國大企業與近代中國的國際化》一書的謝詞將本書獻給張玉法院士，特別感謝張老師予我人生智慧的啟發。兩位恩師都是謙謙君子，更有著雄厚的心靈根柢，在學術的這塊田地中，兩位老師追求純然知識的精神，時時提醒著我，學無止而知無涯，大器存於海底，學術這件事我們不過是在被人翻耕過無數遍的田地上隨手種了些不同的莊稼而已。

在結束本文之前，我想略提個人對歷史書寫的簡短自我反省。最近遇到

一位政治學者提到去年七月底美國參眾兩院一致同意通過，禁止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申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American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NSF）的研究經費，其理由是認為美國政治科學的研究不切實際，無補於國家社會發展的需要。他提到 David Ricci 在 1984 年出版《政治科學的悲劇》（The Tragedy of Political Science）一書，認為美國政治科學在「政治」、「學術」、「學科」等三方面有重大的扞格，形成爭議不斷，卻有無從化解的困境。近十餘年來美國政治學「改造運動」對實證主義的政治科學的根基展開批判和重建。筆者非政治學背景，乍聞此事覺得不可思議，但這個決議的背後蘊藏了非常深刻而長遠的對於「社會科學」性質爭議問題，以及政治學者本身學思之路的反省。這位朋友提到這項政治科學方法論的內在危機，從另一角度而言危機正是轉機。美國政治科學界勇於自我批判的精神，在學術方法上的自我反省，正是學者不斷進步的力量。同樣的，在歷史學門內也有師長期勉近現代史的研究仍必須有人關注重大議題，才能與目前急於主導並重建近現代史史觀的中國大陸學界進行對話，否則將失去歷史發言權。也有些朋友提到我們的選題距離讀者越來越遠，專題越做越專，太多的城垛式引文，外加註腳堆砌，難怪歷史系的學生也不願讀自己老師的作品。這些問題，我必須承認自己也犯有一樣的毛病，我的學生大概也沒讀完我的專書。歷史研究特重資料來源，有引有註，為考證內容和澄清問題有時不得不引用原文，但該如何找到一個適切的書寫方式吸引閱聽人，或是重探歷史重大問題，在過去、現在和未來對話中找出新意，或是在學術宏意中帶出故事興味且具有可讀性的作品？我想有更多的學者比我更適合發言，在此不論。在論文標題上，我的學術伴侶政大彭明輝教授（吳鳴）對目前國內外雙節棍式論著標題已達泛濫的情況多有微辭，我在最後給書稿命名時，採納了他的意見，如果能用一句標題，簡明具體表達題旨，不必選擇雙節棍命名。明輝因長期保有寫作的好習慣，加以他對各種文字書寫（古典、現代文學和網路書寫）的敏感度，時時叮嚀我歷史書寫中不自覺的慣習毛病。有時我因不解民初外交檔案中的毛筆字就教於他時，他三兩下即指出檔案文字的箇中要害，並特別要我留意檔案文本的敘事化問題。數年前當明輝指出一些歷史書寫的時代病徵時，我尚未意識到他長期關注近代學術史的學風轉向，以及新舊典範的建立，以致有此敏銳之觀察。如果我還有下一本學術專著，我想我會更加反省自己在學術書寫上的缺陷和不足。



對於人文學者而言，寫專書的意義應大於寫論文，歐美的人文學者莫不以出專書為目標，很少人在乎一年寫了多少篇的 SSCI 或 A&HCI 論文，在意的是寫了怎樣的專書，是否有影響力，人文學者莫不以出書為目標。當然出第一本書是 Tenure Track 的基本門檻，一本書的撰寫計畫可能是十年磨一劍，也可能是石沉大海，但學者之間彼此會知道某人正在寫某本書；學者互相介紹時，很容易聯想到這位學者的代表著作。目前大學的獎勵研究和評鑑制度多以 I 計點的方式，對於人文學科的長期發展可能是弊大於利，科技部的專書寫作計畫應也是在此一精神下鼓勵人文學者著書立說。

最後，對於科技部支持人文及社會科學專書的出版再次表達敬謝之意。如果要提出怎樣的建議話語，我會覺得對於大學老師申請專書寫作計畫的時間可略為寬鬆，因為大學教師尚有提升教學專業和關照學生學習之義務，而出版前的送審和送審後的排版，這個時間可能就耗費半年到一年的時間。等待審查結果的階段，也正是作者可以再三潤飾初稿的最好時機。